

宋大川 主编

北京考古史

清代卷

下

张中华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架建议：考古/历史

ISBN 978-7-5325-6529-0



9 787532 565290 >

定价：1080.00元（全十一卷）

易文网：www.cwen.cc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

宋大川 主编

北京考古史

清代卷

张中华 著

下

上海古籍出版社

第四章 寺庙宫观遗存

第一节 清代的宗教

不同民族与宗教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有清一代,清政府采取的民族宗教政策基本上是开放的、宽容的,究其原因,满族是在女真人的基础上吸收蒙古人、高丽人、汉人以及其他民族成分而逐渐形成的民族共同体,满族的宗教像汉族一样,主要是多神教,有祖宗牌位,也信仰多神,所以宗教信仰很容易开放。清朝满族之所以能统治中国近三百年,也是因为满族统治者对中国民族宗教的多样性有清醒的认识,尤其在清朝前期,能够区别对待各民族的宗教信仰,不要求各民族与其保持一致。清朝政府尊重其他民族的宗教信仰,对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汉族,对边疆少数民族,满族统治者都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即“以天下为一家,以万国为一体,深仁厚泽所以嘉惠藩服者”。^[1]

清代宗教文化的总体特征的表现比以往任何朝代都更为复杂,宗教文化是多元的,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既有正统的宗教,也有非正统的宗教;既有上层的,也有民间的;既有本土的,也有外来的;在价值取向上既有相融的,也有不兼容的甚至是相斥的。

北京地区的寺庙宫观数量众多,在全国来讲都是首屈一指的。乾隆十五年(1750年)完成的《京师全图》中,登记有寺庙宫观数量1 207处,几乎每条主要街道和胡同,都有一两处。^[2]1928年北平特别市共登记寺庙宫观数量为1 631处,1930年为1 734处,1936年则降为1 135处,到了1941年更是减少为783处。^[3]截至目前,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多座宗教建筑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发掘,主要是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建筑。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以长生不老之道作为最高信仰,劝人通过养生修炼和道德品行的修养而长生成仙,道教文化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道教自东汉顺帝时产生后就开始在北京流传了,即张角所创立的太平道。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尊新天师道为北魏国教,道教在北京的影响力也日益增加。东魏、北齐时期,因为当权者认为道士多伪滥并且影响经济的发展而一度禁绝道教,北京的道教处于停滞状态。直到北周、隋代,统治者对道教采取了扶植政策,道教得到较大的发展。唐朝时,由于李氏王朝尊奉老子为始祖,道教始终得到统治者的推崇。唐

[1] 《日下旧闻考》卷一〇七《郊垌》。

[2] 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北京市文物局资料信息中心:《加摹乾隆京师全图》,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

[3] 王国华:《北京的寺庙》,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寺庙历史资料》,北京档案出版社,1997年。

朝开元二十九年(791年),在幽州建天长观,即今白云观的前身。辽金元明时期,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对道教采取控制和利用的政策,道教在北京得以广泛地传布。清朝统治者信仰的原是萨满教,后尊奉佛教,但为了笼络汉民族,顺治、康熙、雍正对道教上层人士笼络的同时,又采取防范和限制政策。顺治十三年,顺治帝曾指示礼部:“儒释道三教并重,皆使人为善去恶,反邪归正,遵王法而免祸患。”^[1]康熙皇帝曾召见王文卿,赐以匾额对联。雍正皇帝也曾召见白云观道士贾士芳、龙虎山正一法官娄近桓入宫为其治病,还封张伯端为“大慈圆通禅仙紫阳真人”。^[2]乾隆及其以后的皇帝对道教兴趣不大,且多有抑制,可见道教在清王朝上层的地位日益低落,但在民间道教的影响力仍然十分巨大。道教信仰与民间信仰的相互渗透更加紧密,最典型的是关帝成为官方、道教和民间都特别尊崇的神灵。三国时代的历史人物关羽在明代已经取代姜太公而成为与“文圣”孔子并肩的“武圣”,尊封为大帝或帝君,清代历代皇帝追封,至光绪时封号已长达26字。而在民间,关帝还具有司命禄、佑科举、治病祛灾、巡察冥界等功能。关帝崇拜贯通上下,遍及全国(西藏、内蒙都有关帝庙),仅京城之内就有关帝庙116座,为京城庙宇之冠。北京地区著名的道教建筑还有“五顶”,即南顶、北顶、东顶、西顶和中顶。已进行考古发掘的道教官观以城区最多,郊区也占一定数量。

佛教自西汉末年、东汉初年传入中国,公元4世纪中叶,佛教已在北京地区传播,最直接的证据就是潭柘寺的创建。北朝时期,北京地区佛教的发展要比中原地区落后,本地区的很多僧人纷纷外出求学,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如昙无竭于北魏明元帝泰常五年(420年)开始西游天竺,并著《观音受记经》。隋朝时期,著名僧人静琬立志创刻《诗经》,创建了云居寺。唐朝时,唐太宗、武则天先后崇奉佛教,使佛教得到迅速发展。如今北京的法源寺,其前身就是唐太宗为纪念征讨辽东阵亡将士而修建的悯忠寺。辽朝统治者本信奉萨满教,在汉文化的影响下开始信奉佛教。至辽人从石敬瑭手中得到幽州并立为南京后,北京成为整个辽代佛教发展的主要基地之一。辽代各代帝王崇奉佛教的风气日盛一日,民间佛教也得到较大发展,朝廷拨款继续支持云居寺雕刻石经,还在南京城内外兴建了大量佛寺,佛教在辽代臻于极盛。金代统治者把佛教当作巩固统治的工具而不是盲目崇拜,将宗教活动纳入国家管理,对佛教基本上是采取严格控制的政策。元朝从成吉思汗起,蒙古贵族就信奉藏传佛教,忽必烈建立元朝后就将藏传佛教立为国教,并以八思巴为国师,总领全国佛教。藏传佛教也随着元朝的建立进入北京地区,北京也逐渐成为全国佛教发展的中心。明初对佛教采取既利用又控制的政策,支持汉传佛教各派。自明成祖朱棣开始起,上自皇帝,下至太监,对佛教十分推崇,在北京各地纷纷建立佛寺。清代对佛教沿袭了明朝的政策,即利用加控制。为加强对佛教的管理,在北京设立僧录司。自顺治定鼎北京,历经康、雍、乾三朝,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佛教再度复兴和发展起来。到康熙六年(1662年)时,直隶各省兴建的新寺、修复的旧寺数额甚至超过了明朝全盛时期,佛教僧众数量也大幅增长。据康熙六年礼部统计,各省官建大寺6 073处,小寺6 409处;私建大寺8 458处,小寺58 682处,合

[1] 《福建通志》卷首一《典谟一》。

[2] 《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卷十七《碑文》。

计79 622处。僧众110 792人,尼众8 615人,合计119 407人。有清一代,统治者不仅尊崇汉传佛教(又称喇嘛教、黄教),对藏传佛教也是不遗余力地支持。清政府尊崇藏传佛教,并非出于信奉,而是利用喇嘛教控制蒙藏民族,使西藏、特别是蒙古诸部诚心归附。在满族入关之前,五世达赖就与满族贵族取得了联系,其使者受到了皇太极的隆重接待。清王朝建立后,但各地的反抗还没停止,西北诸部也不安宁,因此对清王朝来说,稳定蒙古诸部至关重要,藏传佛教成为最好的工具。^[1]就如乾隆所说:“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2]顺治九年,五世达赖来京朝觐,顺治帝甚至要御驾亲迎,在大臣的谏言下,方才数次派大臣途中相迎。^[3]为接待五世达赖,清政府修建了第一座喇嘛庙西黄寺。五世达赖到京后,顺治帝遂在南苑猎场接见,并赐白银九万两。顺治十年,五世达赖启程返藏,顺治又派亲王大臣率八旗兵护送,途中又颁赐金册金印,晋封五世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坦喇达赖喇嘛”。^[4]从此,达赖的封号正式确立,历代达赖喇嘛转世须经中央政府册封,也成为定制。此后,达赖与班禅每隔一年皆遣使赴京朝贡。六世班禅于乾隆四十四年自西藏起程,来京贺乾隆帝七十大寿,次年到热河行宫觐见乾隆帝,乾隆还在热河为其兴建了“须弥福寿之庙”,另外在香山还准备了昭庙供班禅居住。有清一代,北京地区兴修了许多喇嘛庙,据佟洵老师统计,达40多座。^[5]清代,中国佛教之汉传、藏传与南传三大系统、各系之中又有不同派系的格局已经成形。清朝后期,随着国势的衰落,佛教的盛况也一去不复返了。到了民国时期,由于社会动荡不安,战乱纷扰,兵火殃及,北京的佛教寺庙急剧减少。北京的寺庙多分布于北京城区和山区,特别是在城区,几乎每条胡同内都有寺庙。在众多的庙宇中,既有皇帝敕建的,亦有臣民信徒捐建的,规模也视等级和财力在进数和建筑体量上有所区别。^[6]在已发掘的7个清代佛教寺庙遗址中,有3处位于城区,4处坐落于城郊。

伊斯兰教与佛教、基督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伊斯兰教于辽代传入北京,最早的真清真寺为建于辽统和十三年(995年)的牛街礼拜寺。^[7]元朝时,回回的地位仅次于蒙古人,许多回回在元朝都担任要职,其信仰的伊斯兰教也得到扶植和重视,政府还设立了专门管理全国伊斯兰教事务的机构。据刘致平先生研究,中统四年(1263年)时,元大都有回族人两千九百五十三户,按户均五人计算,达一万五千人,约占元大都人口的十分之一强,有清真寺35座。^[8]可以说,元朝是伊斯兰教在北京地区空前发展的一个时期。伊斯兰教没有因为元朝的灭亡而衰落,反而在明朝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供穆斯林进行礼拜的清真寺也增多起来。清政府对伊斯兰教采取宽容和利用的政策,北京地区大量兴建和翻修清真寺,北京也成为伊斯兰学术的中心。^[9]清朝前

[1] 陈平:《西黄寺与喇嘛教》,《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一辑),1983年。

[2] 《御制文集·三集》卷四《喇嘛说》。

[3] 《世祖章皇帝圣训》卷二《敦睦》。

[4] 《张文贞集》卷八《纪》。

[5] 佟洵:《佛教与北京寺庙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

[6] 朱耀廷、崔学谕主编,张连城、孙学雷编著:《北京的佛寺与佛塔》,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年。

[7] 北京市文物局编:《北京文物地图集》,科学出版社,2009年。

[8] 刘致平:《中国伊斯兰教建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

[9] 朱耀廷、崔学谕主编,佟洵等编著:《北京宗教文物古迹》,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年。

期尤其尊重伊斯兰教,康熙、雍正年间,北京回、汉之间发生矛盾,康熙、雍正下令绝对尊重伊斯兰教,穆斯林后来把康熙圣谕刊刻在北京牛街清真寺的石碑上。但在清朝中后期,统治者挑拨回汉之间以及回族伊斯兰教不同派别之间的关系,以达到其“分而治之”的政治目的,激起反抗后又采取过激措施严酷镇压穆斯林起义和汉族人民的反抗活动。清政府把伊斯兰教的哲赫林耶派以及汉族的民间宗教——白莲教、青莲教、大乘教、黄天教等定为邪教,不允许它们合法存在,对回汉之间以及伊斯兰教不同派别之间的矛盾处置不当,拉拢汉族上层压制回族,拉拢伊斯兰教的老教打击新教,引起回汉人民反抗,然后无情杀戮,致使回族人口锐减、伊斯兰教的发展严重受挫。清代北京清真寺的数量不但多,而且分布范围广,内城、外城、郊区均有清真寺分布。

第二节 天宁寺钟、鼓楼

一、历史沿革

北京天宁寺位于北京市宣武区西北部,东邻天宁寺农副产品市场,西邻华电(北京)热电有限公司,北邻北京市唱片厂,南为天宁寺前街。

天宁寺创建于北魏孝文帝时,时称光林寺。^[1]《续高僧传》也说该寺“即元魏孝文之所造也,旧号光林”。^[2]隋仁寿间,称宏业寺,并建塔藏舍利。^[3]源于“隋文帝遇阿罗汉授舍利一囊,与法师昙迁数之莫定多少,乃以七宝函致雍岐等三十州,州建一塔,天宁寺塔其一也。塔高三十三寻,四周缀铎万计,风定风作音无断时”。^[4]《广宏明集》更是明确记载:“仁寿二年正月,分布舍利五十一州建立灵塔。幽州表云三月二十六日于宏业寺安置舍利石函。”^[5]据梁思成先生考订,现存天宁寺砖塔系辽代所建。^[6]刘卫东先生《天宁寺及塔调查今记》中交代,1991年返修天宁寺塔宝顶时发现一方形石刻,碑名“大辽燕京天王寺建舍利塔记”,碑文中有“天庆九年(1119年)五月二十三日,奉圣旨起建天宁寺塔一座,举高二百三尺相计,共十一个月了毕”。^[7]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两点信息,一是天宁寺在辽代称为天王寺,二是现存天宁寺塔建于天庆年间。《燕京崇寿禅院故圆通大师朗公碑铭》中述及圆通大师李祖朗的生平,圆通大师系渔阳人,九岁出家,拜燕京大圣安寺圆通国师为师,大定十三年于京西宏业寺受具,至二十一年改宏业寺为大万安禅寺。^[8]天宁寺曾毁于元末战火,朱棣为燕王时命有司重修,宣德年间勅更天宁寺。^[9]《隩志》更明确天王寺更名为天宁,为宣德十年的事。塔下有碑勒更名勅,碑阴则正

[1] 《畿辅通志》卷五十一《寺观》。

[2] 《日下旧闻考》卷九十一《郊坰》引《续高僧传》。

[3] 《日下旧闻考》卷九十一《郊坰》引《神州塔传》。

[4] 《日下旧闻考》卷九十一《郊坰》引《帝京景物略》。

[5] 《日下旧闻考》卷九十一《郊坰》引《广宏明集》。

[6] 梁思成:《梁思成文集》第一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2年。

[7] 刘卫东:《天宁寺及塔调查今记》,《首都博物馆丛刊》1993年总第8期。

[8] 《湛然居士集》卷八。

[9] 《日下旧闻考》卷九十一《郊坰》引《长安客话》。

统十年刊行藏经勅,碑后有辽重熙十七年五月立尊胜陀罗尼石幢。^[1]正统二年、十二年曾两次重修。到了清代,乾隆二十一年又进行重修,殿前立有《御制重修天宁寺碑》,殿内有御书匾联,塔垣东南有一碑为康熙十一年尚书龚鼎孳撰写,寺西北有别院宗师府,为姚广孝旧居。^[2]据记载,因姚广孝在朱棣“靖难之役”中立下汗马功劳,胜利后永乐皇帝欲为他建立府第,他力辞不受,仍居庆寿寺,后退居天宁寺。^[3]另外,有的文献还提到正统三年曾重建天宁寺,^[4]正统间还将天宁寺改称万寿戒坛。^[5]寺中石碑记载,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也曾分别重修。建国后,天宁寺为北京唱片厂厂区,寺庙山门成为民居,寺庙周围建起许多建筑物,将天宁寺遮挡起来。1976年地震时将塔刹震落,局部瓦件坠落,但塔身基本完好。^[6]1988年天宁寺塔院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世纪90年代,北京市政府利用西厢工程和天宁寺小区改造,人们才得以从外面一睹天宁寺塔的雄姿。

二、天宁寺钟、鼓楼遗址

2007年10月19日至11月5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受北京市佛教协会的委托,对天宁寺钟、鼓楼遗址进行了考古试掘工作,试掘面积190平方米,清理了3组建筑基础。^[7]

试掘范围在天宁寺院南部接引殿之南的东、西两侧花圃内,即A、B两区。

A和B区共清理了F1、F2和F3三组建筑基础。

1. F1

位于A区的南部,北距药师殿42米。开口于②层下,距地表深0.27~0.42米,坐东朝西,方向277°。西部压于天宁寺院内地面下而没有发掘,面阔6.5米,发掘部分进深3.6米(图二二一)。

南墙、北墙和东墙都是用大小不等的残砖砌成,用白灰加泥勾缝,其中南墙宽0.4米,残高0.06~0.55米;北墙宽0.75米,残高0.05~0.45米;东墙宽0.4米,残高0.06~0.4米。墙下有厚约0.7米的夯土,共分4层。

地面为夯土,夯土用内含有碎砖、瓦片、青花瓷片、白瓷片的渣土加少量白灰打成,厚约1.7米,共分十一层。夯层上见排列规则的圆夯夯窝,直径0.05、深0.02~0.04米(图二二二)。夯土下为质地较硬的渣土,厚1.5~2.25米。其下为生土。

东北角残留一礅墩,呈方形,边长0.6米,系青砖残块用白灰加泥土砌制,残留一层砖,高0.06米(图二二三)。

南、北、东三墙外均残留有散水,散水宽0.6米,用残砖块铺就,外用小青砖块匝边,小青砖块规格为0.24×0.12×0.04立方米。

[1] 《日下旧闻考》卷九十一《郊坰》引《輶志》。

[2] 《日下旧闻考》卷九十一《郊坰》。

[3] 《明史》卷一百四十五《考证》。

[4] 《明一统志》卷一《京师》。

[5] 《大清一统志》卷七《顺天府》;《畿辅通志》卷五十一《寺观》。

[6] 沈蕾:《千载隋皇塔,相轮云外见——天宁寺》,佟洵主编:《佛教与北京寺庙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

[7]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天宁寺钟、鼓楼遗址试掘简报》,《文物春秋》2008年5期。

另外,在F1东北部有一南北向长方形凹槽,长1、宽0.5、深0.43米,东西两壁贴边砌砖,用途不明。凹槽东侧有一方形砖台,砌于地面之上,边长0.7、高约0.32米。砖的形制不同于F1墙砖,疑是晚于F1始建时期的遗存。从位置和形制推测F1为天宁寺钟楼遗址。



图二二一 天宁寺钟楼遗址



图二二二 天宁寺钟楼内夯窝



图二二三 天宁寺钟楼内礅墩

2. F2

位于A区北部,与F1相距1.4米,北距药师殿31米,北部为一现代房基破坏。开口于②层下,距地表深0.25~0.45米,坐东向西,方向277°。其西部压在天宁寺院内地面下没有清理,面阔9.8米,清理部分进深3.68米(图二二四)。

基础为夯制,厚0.51米,共分4层,每层厚0.11~0.13米,前两层为三合土,以下两层用渣土打成。夯土下为较硬的渣土,包含有砖块、瓦片、瓷片、白灰等,厚2.9米,以下为生土。



图二二四 天宁寺F2局部(由北向南)

南墙、北墙和东墙仅残存一层砖,残高0.1~0.13米,其中南墙和北墙宽0.53米,东墙宽0.6米,均以不同于F1的大青砖残块砌制,用白灰加泥勾缝。

3. F3

位于B区,北距弥陀殿42米,与F1相距32米。开口于②层下,距地表深0.25~0.4米,有一现代房墙基础南北向贯穿中部并打破F3南、北墙及其散水,一现代小排水沟东西向贯穿中部并打破F3西墙及其散水,西部及西北角均有大石压于散水之上。坐西朝东,方向97°。其东部压在天宁寺院内地面下没有清理,面阔6.5米,清理部分进深3.6米(图二二五)。

南墙、北墙和西墙都是用大小不等的残砖砌成,用白灰加泥勾缝,宽约0.4米,其中南墙残高0.06~0.25米,北墙残高0.05~0.28米,西墙残高0.06~0.4米。



图二二五 天宁寺鼓楼遗址(由南向北)

加少量白灰打成,厚约1.7米,共分十一层。夯土下为质地较硬的渣土,厚2.36米。其下为生土。

南、北、西三面台基外均残留有散水,散水宽0.6米,散水面距现地表0.55米,散水用残砖块铺就,外用小青砖块匝边,小青砖块规格为 $0.24 \times 0.12 \times 0.04$ 立方米。

与F1、F2不同的是,F3上的青砖上多见沟纹。从位置和形制推测F3为天宁寺鼓楼遗址。

通过此次对天宁寺院南部A、B两区的发掘,主要有以下几点收获。

第一,从A、B两区内清理的F1和F3的位置与形制来看,应该分别是钟楼和鼓楼的遗存。

第二,F1、F2和F3的清理,使我们对天宁寺院南部的布局有了一个大致地了解。

第三,根据钟楼和鼓楼的形制以及建筑材料,初步判断它们为清代遗存。

第四,通过此次发掘,为天宁寺钟楼和鼓楼的复建提供了科学的资料和依据。

第三节 普度寺

一、历史沿革

普度寺位于东城区南池子大街内普庆前巷35号。

据史料记载:“普度寺为明小南城旧宫遗址,宫名崇质,明英宗北还,居之,谓之小南城。顺治初,改为睿亲王府。康熙三十三年,建玛哈噶喇庙。乾隆四十年修,四十一年赐名普度寺。”^[1]可见,普度寺曾先后作为宫殿、王府和佛教寺庙等,见证并承载了多次皇室、社会的风云动荡,历史演变轨迹清晰而曲折,文化积淀深厚且独特,是一处珍贵的历史遗产。

普度寺所在的位置曾是元朝太乙宫神坛的所在地。^[2]明成祖朱棣夺取帝位后,迁都北京,在着手规划、设计、建造北京城时,于皇城内的东西两翼对称地规划了两处皇家园林。西部园林以太液池(即今北海、中海)为核心,称为西苑。东部园林位于东华门外的东南部,称作东苑,^[3]如今的普度寺就位于当时的东苑之中。东苑建成后,成为皇帝经常游幸的场所。当时明成祖还为其最喜爱的皇太孙朱瞻基,即后来的明宣宗,专门在此修建了皇太孙宫。^[4]明宣德年间,朱瞻基即位后,便对其龙兴之所进行了扩建和增修。明宣宗除在东苑内设立读书悦心的地方,还建有斋宫、重华宫、崇质宫等,当时又称之为“南内”或“南城”。

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瓦剌首领也先便以明朝削减其马价等事为借口,发兵进犯明朝。不懂军事却又好大喜功的宦官王振此时却极力怂恿、鼓动明英宗御驾亲征瓦剌。七月十七日,明英宗任命太监金英辅佐其弟郕王朱祁钰留守京城主持政务,兵部侍郎于谦留京代理部务,自己御驾亲征也先。结果,明军被围困于土木堡,“未及交兵,我师颠顿,莫能为计,相与枕藉

[1] (清)周家楣、缪荃孙等编纂:《光绪顺天府志·京师志十六》,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76页。

[2] 常华:《普度古刹话沧桑》,《北京档案》2003年1期。

[3] (清)吴长元辑:《宸垣识略·皇城一》卷三,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45页。

[4] (明)徐学聚撰:《国朝典汇·工部》卷一百九十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402页。

于胡马蹴踏之余矣”。^[1]兵士死伤惨重,而明英宗在混战之中见突围不成,便下马盘膝就地而坐,成为瓦剌的俘虏。

明英宗被俘后,在动荡飘摇中,朱祁钰即皇帝位,尊明英宗朱祁镇为太上皇,并改元景泰。景帝即位后,任用于谦积极组织备战,最终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

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也先放明英宗南归,“上皇自东安门入,上迎拜,上皇答拜,各述授受之意。推逊良久,乃送上皇至南宫。百官随至南宫,请朝见敕日”。^[2]明英宗北还归来,随即被安置于南宫,其实就是禁锢于此。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在部分朝臣、宦官谋划的宫廷政变下,太上皇明英宗在时隔八年后又再次复位,^[3]史称“夺门之变”、“南宫复辟”。朱祁镇复位后,将小南城在原来的基础上重新进行整修,增建了一些殿宇。^[4]由于明英宗的重视和增建,在南内之中宫、殿、馆、阁等一应俱全,其建筑规模达到了鼎盛。^[5]

普度寺在清初为多尔袞府邸。多尔袞是太祖努尔哈赤的第十四子,^[6]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十月二十五日生于赫图阿拉。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皇太极即皇帝位,国号大清。论功行赏,多尔袞被封为和硕睿亲王。在多年的征战中,多尔袞屡立战功,表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崇德八年(1643年),皇太极于沈阳清宁宫暴逝。皇太极的死亡过于突然,还未及对身后之事作出任何安排,这不可避免地将造成大清政权内部政治斗争的激烈化和公开化。在各方势力的制衡下,皇太极的第九子、年仅六岁的福临被立为皇帝,由多尔袞和济尔哈朗为左右辅政,多尔袞实际上掌握了清廷的实权。顺治元年(1644年)六月,在吴三桂的配合下,清军占领了北京。十月初一日,顺治帝正式登基,封多尔袞为叔父摄政王,确立了多尔袞在清朝统治阶层中不同于其他王公贵族的独一无二的政治地位。多尔袞的府邸——睿亲王府系在明皇城中南内的基础上改建而成的,即今天普度寺所在的位置。由于多尔袞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其府邸的规模、等级超高了一般的亲王,据说是“翬飞鸟革,虎踞龙蟠,不惟凌空挂斗,与帝座相同,而金碧辉煌,雕镂奇异,尤有过之者”。此时的多尔袞权势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身份、地位仅次于顺治帝。仅从其封号来看,多尔袞为“叔父摄政王”,而与其共同辅政的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的封号则为“信义辅政叔王”,“叔父王”和“叔王”为爵秩专称,而非家人通称,二者的一字之差,显示出了多尔袞更为尊崇的地位。^[7]多尔袞一人独掌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而顺治帝此时尚年幼,政事均听从于多尔袞,“遂以母弟多铎为辅政叔王,背誓肆行,妄自尊大,所用仪仗、音乐、卫从俱僭,拟至尊造府,与宫阙无异”、“凡一切政事及批票本章,不奉上命,概称诏旨。擅作威福,任意黜陟。凡伊喜悦之人,不应官者滥升,不合伊者滥降,以至

[1] (明) 陆容撰:《菽园杂记》卷四,中华书局,2007年,第45页。

[2] (明) 徐学聚撰:《国朝典汇·复辟》卷三,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23页。

[3] (清) 张廷玉等撰:《明史·徐有贞传》卷一百七十一,中华书局,2007年,第4562、4563页。

[4] (明) 朱国祯撰、王根林校点:《涌幢小品》卷四《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200页。

[5] 《钦定四库全书》卷四十《皇城》。

[6] (清) 钱仪吉纂:《碑传集》卷一《宗室上》,中华书局,2008年,第5页。

[7] 郑天挺著:《探微集》(修订本),中华书局,2009年,第136页。

僭妄悖理之处,不可枚举。不令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入朝办事,竟以朝廷自居,令其日候府前”。^[1]清初诗人吴伟业曾有诗句“七载金归掌握,百僚车马会南城”,生动地描绘出了当时睿亲王府的盛况。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多尔袞病死在边外喀喇城,年仅39岁。顺治帝下诏为他举行国丧,并追尊为其“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顺治八年正月十九日,又将多尔袞夫妇同祔于太庙,二十六日,福临正式颁诏,将尊多尔袞夫妇为义皇帝、义皇后之事并同祔庙享之事公诸于众。但不久,顺治帝便发出诏书追罪多尔袞,追夺了一切对多尔袞的封典,并毁墓掘尸,没收财产。而睿亲王府,随着多尔袞的倒台而被查封,往昔的繁荣和辉煌也不复存在。

睿亲王府被查封后,其中的一部分先被划分出来改作了缎匹库。^[2]普度寺旧名玛哈噶喇庙,康熙三十三年建,乾隆四十年修,四十一年赐名曰普度寺,大殿额曰“慈济殿”,殿内额曰“觉海慈航”,皆皇上御书。寺内殿基高敞,去地丈余。国初为睿亲王府,相传即南城旧宫后改今寺。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特将原来的睿亲王府改建成为藏传佛教寺庙,供奉藏传佛教的护法战神玛哈噶喇(又名“大黑天”),成为玛哈噶喇庙。玛哈噶喇是藏语,出自梵文,意为“大黑天神”,是藏传佛教密宗的重要护法神,他被说成是文殊菩萨的化身,是神力武功的象征,常被秘密供养、修持。乾隆四十年(1775年),乾隆皇帝下令对玛哈噶喇庙重加修整。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乾隆帝赐名为普度寺,并亲自题写了大殿匾额“慈济殿”,殿内题额“觉海慈航”。^[3]乾隆四十三年(1758年),乾隆感多尔袞劳苦功高,为他翻案,其爵位得到恢复,并配享太庙。^[4]此后,为纪念多尔袞,特在黑护法佛殿内收藏多尔袞生前曾用过的甲冑弓矢。

1912年辛亥革命爆发,满清政府被推翻。之后,国民政府将普度寺改为了小学,最初称为国民三小,后来又先后改称为普度寺小学和南池子小学,普度寺自此开始了它近80年的校园历史。1984年,普度寺大殿被北京市人民政府正式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政府决定腾退南池子小学,并搬迁了近二百户的居民,对普度寺进行了修缮和保护。如今,普度寺又改为了税务博物馆。

二、普度寺遗址

1. 遗迹

2002年1月至8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位于皇城东南部的普度寺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共4996平方米,揭露出影壁、房址、月台、散水、抱厦、院落等多处遗迹(图二二六)^[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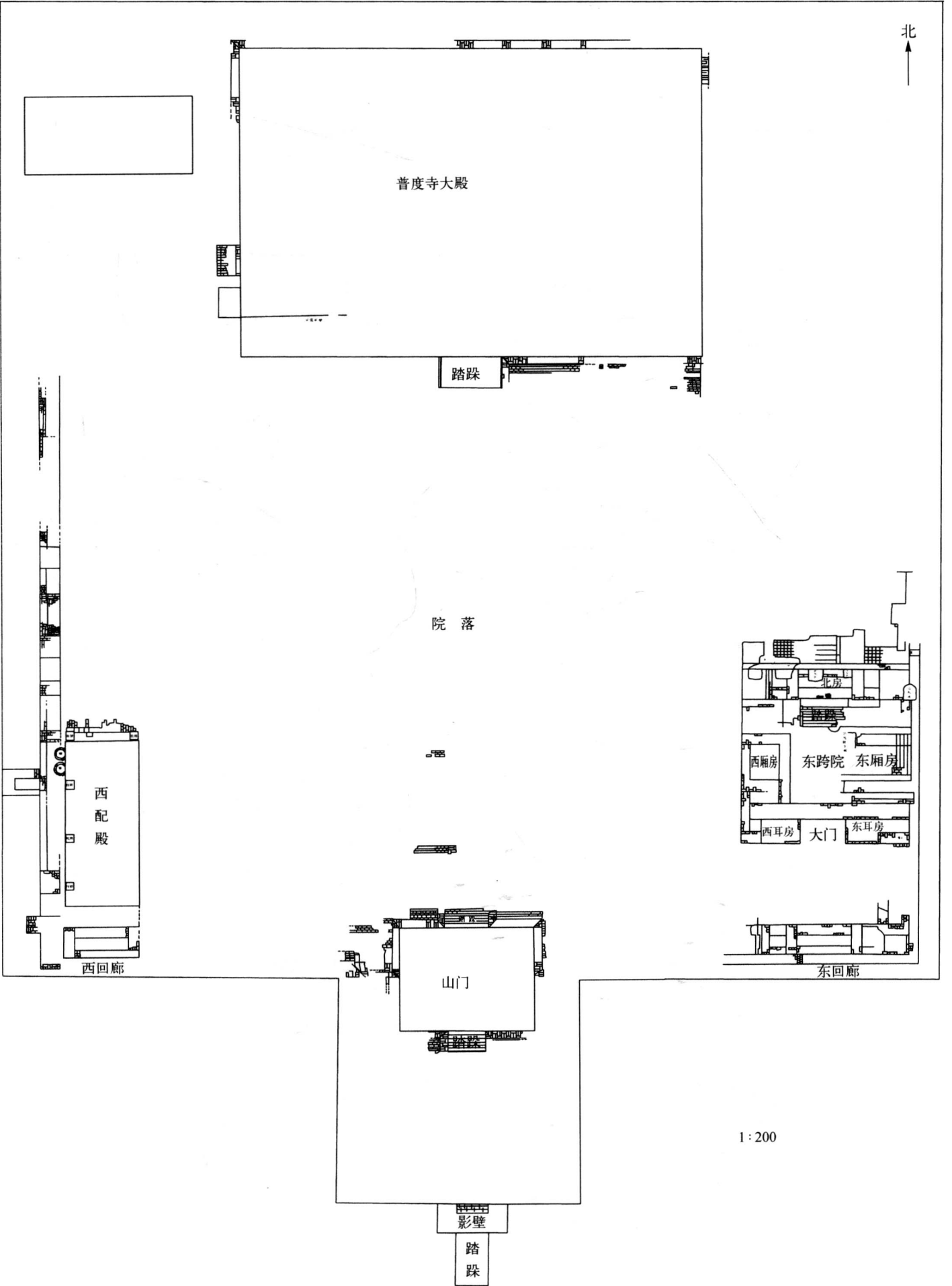
[1] 《钦定八旗通志》卷一百二十五《人物志》。

[2] (清)昭槁撰、何英芳点校:《啸亭续录》卷四,中华书局,1997年。

[3] 《钦定四库全书》卷四十《皇城》。

[4] 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一册,中华书局,1984年。

[5] 李永强、朱志刚:《普度寺遗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著《北京皇家建筑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9年。



图二二六 普度寺遗迹总平面图

普度寺遗址发掘区域内的地层堆积较为简单,仅有一层,即近现代扰土层。土色为灰褐色,土质松软,土层厚0.5~1.95米。土层中包含大量的红色渣土、三合土残块、残砖碎瓦以及现代塑料、玻璃残片等,扰土层之下即为清代建筑遗迹。普度寺的地势北高南低,东部略高于西部,因此,遗址的南面堆积稍厚。

普度寺坐北朝南,此次发掘揭露出的遗迹可分为中路建筑及东西两侧建筑。中路建筑遗迹主要包括影壁、山门、院落、大殿等四部分,由南向北沿中轴线分布。东侧发现院落遗迹1处,西侧发现配殿基址1处。另外,在山门的東西两端发现了回廊遗迹。以下按中路建筑和东、西两侧建筑分别介绍。

中路建筑遗迹:

该处遗迹自南向北依次分别为影壁、山门、院落、大殿等遗迹,以下按顺序予以介绍。

(1) 影壁遗址

影壁遗址位于山门以南,北距山门前台阶15.8米。东西长7.1、南北宽1米。现在仅残存影壁的基础部分,以砖抹灰顺砌平铺而成。普度寺的地面高于周围地面,因此影壁也有垫砌的平台基座,高出周围地面0.4米。影壁北侧发现有一处石砌踏跺,共4级,每步宽0.33~0.38、高0.1~0.14米,踏跺两边的垂带部分已残。

从影壁向南2.8米处,有石砌踏跺1处。高1.45、南北长5.4米,现仅存东边垂带,石条宽0.32、长1.55~1.64米。踏跺的南侧即为普度寺南巷的路面,据此推测,此踏跺原来应与进入该寺的道路相连接。

(2) 山门周围的遗迹

山门现在仍立于地表,保存较为完整,通阔3间,进深1间,明间南北有穿堂门和踏跺。山门台基东西宽14.1、南北宽10.8、高0.5米。此次考古发掘主要清理出了台基周围的散水和踏跺。北踏跺东西宽4.7、南北长1.45米,分为5级,每级高0.1~0.13、宽0.32~0.43米,两边垂带各宽0.42米。南踏跺东西宽3.9、南北长2.1、高0.9米,共有7级,最底层和散水在同一平面上,每级宽0.32~0.38、高0.13~0.15米。台基周围的砖砌散水保存较好,采用一平两竖铺砌,外面用竖砖匝边。砖长0.44、宽0.22、厚0.1米。

(3) 院落遗址

院落遗址位于山门与普度寺大殿的月台之间。从山门北踏跺至大殿南踏跺,南北长58、东西宽约49米。原地面的埧地砖基本无存,仅在大殿的东南角及山门的北部尚有小片残留。残存的埧地砖采用东西向平行错缝铺砌。砖长0.42~0.44、宽0.2~0.23、厚0.1~0.125米。

(4) 大殿周围的遗迹

普度寺的大殿保存基本完好,因此仅对其台基周围的散水及南部踏跺进行了清理。大殿位于中轴线的北端,坐北朝南。须弥座式台基,东西长47.1、南北宽31.5(包括其南部月台宽度)、高1米。

踏跺位于大殿明间的正南方,东西宽6.2、南北长3米,底部海墁石宽0.52、厚0.2米。共有

8级,每级宽0.42~0.44、高0.11~0.13,两边的垂带各宽0.52米,均用汉白玉条铺砌。

砖铺散水保存状况较差,其上有0.3~0.4米厚的垫土。台基南北两侧的散水保存稍好,东西两侧保存较差,均为断续分布。用青砖两竖一平,交替铺砌,外面有厚0.1米的竖砖匝边,宽0.78米。

在大殿的明间发现了一座转经塔(图二二七)。该塔低于大殿的地面约2米,平面呈圆形,直径约4米,在其顶部有12块异常精美的汉白玉雕。

东西两侧建筑遗迹:

(1) 回廊遗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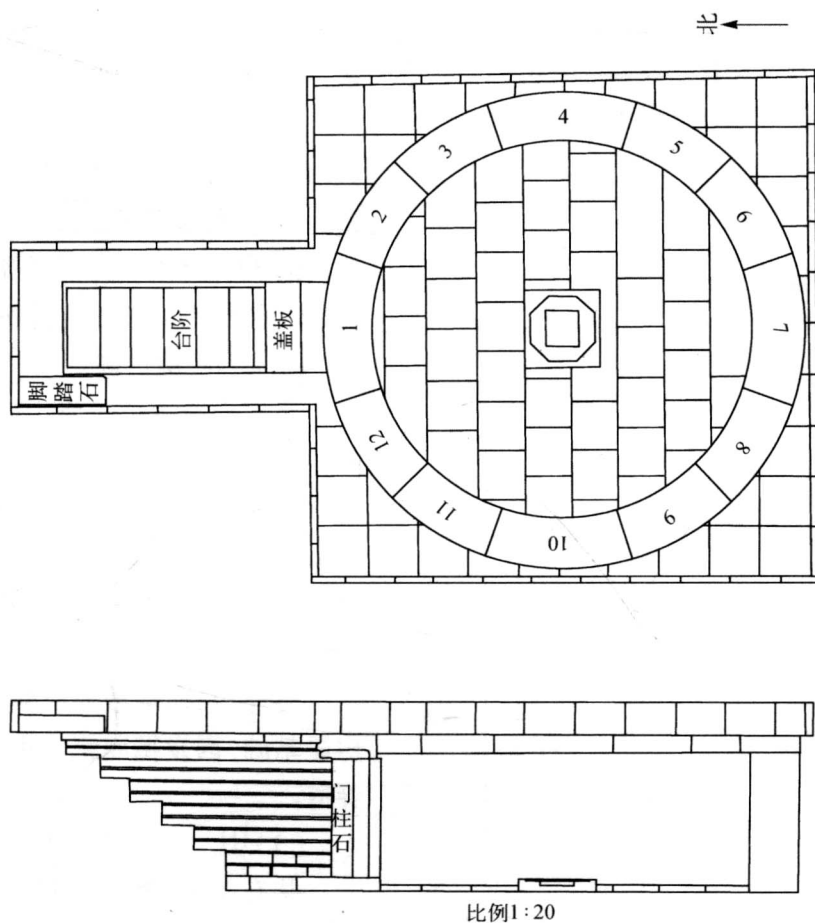
回廊遗迹在山门的東西两端,基本为对称分布。回廊已遭严重破坏,现仅在普度寺东南、西南两角尚有残留。东边回廊保存情况略好。

东回廊位于普度寺的东南角,东西残长15.3、南北宽3米,残存砌砖2层。东端垂直折而向北,回廊北侧露明外侧残留有散水砖痕。在回廊中部,发现有3组连二磴墩。在回廊基础的上面有0.4~0.6米厚的垫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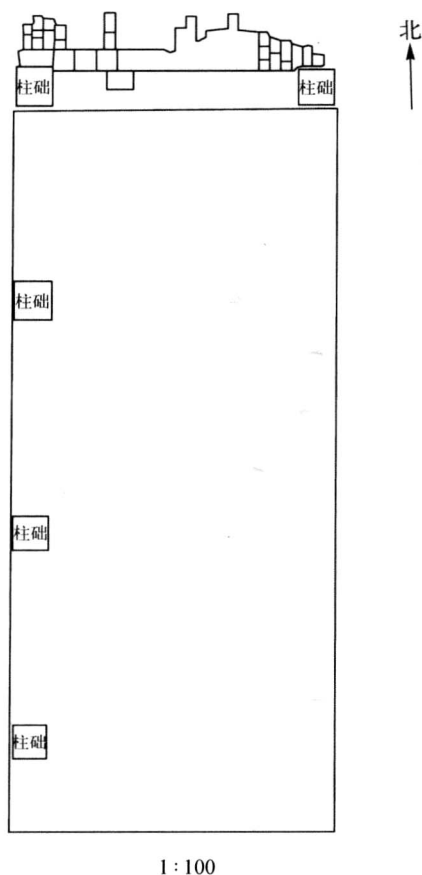
回廊遗迹由南、北露明,连二磴墩组成。北露明东西残存长15.3~15.7、南北宽1.1米。用规格不同的青砖错缝抹灰砌成。用砖规格主要有 $0.48 \times 0.24 \times 0.1$ 米和 $0.45 \times 0.22 \times 0.1$ 米两种。南露明距离北露明约1.1米,东西残长15.3米,砌法和用砖与北露明基本相同。连二磴墩共发现3组。自东向西分别编号为磴墩1、磴墩2、磴墩3。

磴墩1南北长3、东西宽1.08米,距离东散水边4.73米,东西两侧露明较为整齐,南北与回廊南、北露明相齐平。磴墩2东距磴墩1约5.5、南北长3、东西宽1.08米。砌法及用砖与磴墩1相同。磴墩3东距磴墩2约1.7、南北长3、东西残宽0.81米,砌法及用砖与磴墩1相同。

另外,在回廊的北露明外侧,发现了散水遗迹,南北宽约1.2、东西残长12.1米,砌砖已无存,仅在其下垫土中有残痕。



图二二七 转经塔平、剖面图



图二二八 西配殿平面图

回廊东端折而向北,此段回廊东西宽1.03、南北残长1.7米,砌法及用砖规格与东西向回廊基础相同。

西边回廊位于普度寺的西南角,保存状况较差,东西残长8、南北宽3米,发现了2组连二礅墩。北露明东西残长8、南北宽1.1米。南、北露明间距1.3米,南露明宽0.7米。礅墩南北均长3米,与回廊南北露明平齐,宽1.1米,两个礅墩间距5.5米。北露明的外侧亦保留有散水残痕,南北宽1.2米。

(2) 西配殿遗迹

西配殿遗迹位于西边回廊以北约2米处,坐西向东,面阔3间(北端被破坏),进深1间。南北长19.2、东西宽7.5米,西北角残留少量方形铺地砖,较大的铺地砖规格为0.51×0.49米。西侧有4个方形的石质柱础,东北角也有一个柱础。5个柱础的形制、大小基本一致,均边长0.84、高0.26米(图二二八)。

另外,在西配殿的西侧及北部发掘的探沟中,均发现有房屋基础,因发掘面积太小且破坏严重,其结构及布局无法弄清。

(3) 灶

共有两处,都砌筑于三合土硬面上。灶的东部均被叠压于西配殿的后檐墙下。南端的灶编号为Z1,北端的灶编号为Z2。

Z1距地表深0.68米,东部被叠压于西配殿的后檐墙下,半圆形,南北径0.9米。上部已被破坏,仅残留底部红烧土面和灶壁砌砖印痕,砖印大小不一,长0.2、宽0.1~0.13米。

Z2位于Z1北部,二者间距0.45米。Z2距地表深0.65米,呈半圆形,南北直径为0.9米,上部已被破坏,仅残留底部红烧土面和灶壁砌砖印痕。

(4) 东跨院

东跨院遗迹位于东边回廊北侧8.35米,坐北朝南,南北长17.7、东西宽17.05米。由北房、东西厢房、大门、南北耳房等组成(图二二九)。现分别介绍如下。

北房坐北朝南,面宽五间,前有抱厦。东西长16.8米,南北进深3~3.5米。

北房前檐墙东西长16.8米,宽度每段不尽相同。基础用青砖残块抹白灰错缝砌成,用砖规格不一,长0.4~0.48、宽0.2~0.24、厚0.1~0.12米。北房的后檐墙基础破坏较为严重,仅在明间还残留有1段。

明间东西宽5.45、南北进深3米;东次间东西宽2.75、南北进深3.05米;西次间东西宽2.65、南北进深3.05米;东、西稍间大小相同,均东西宽3、进深3.05米。屋内地面铺地砖由大小不一的青砖残块抹白灰铺成,局部因破坏仅存底部三合土。明间南部有踏跺,东部残,西侧垂带尚